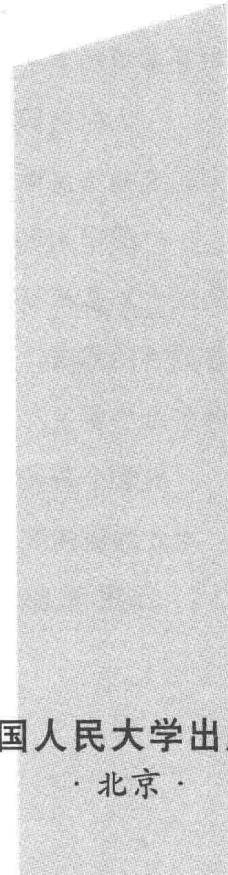


我 悲哀地 望着 我们这一代人

朵渔 著



我 悲哀地 望着 我们这一代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 朵渔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4
(明德书系·文化慢光丛书)

ISBN 978-7-300-22700-9

I. ①我… II. ①朵…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8475 号

明德书系·文化慢光丛书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朵 渔 著

Wo Beiai de Wangzhe Women Zhe Yidai Re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2.625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40 0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辑一

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

- 003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纪念莱蒙托夫二百周年诞辰
- 021 黑暗时代的精神遗嘱
——别林斯基和他的时代
- 040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
- 065 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
——帕斯捷尔纳克的怕和爱
- 083 我代替野兽步入牢笼
——布罗茨基《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四日》细读
- 096 色情、极限与诗歌的吞噬性
——杰克·吉尔伯特和他的诗生活
- 127 奥登：必须爱这个世界
- 148 尼采：醉与梦的形而上学
- 175 米沃什：穿越 20 世纪

辑二

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

- 225 诗歌的光源及我们的现状
- 269 如何证明你写的诗是诗
——反讽，理解西川的一条路径
- 282 素朴而感伤的灰
——吕德安油画近作观感
- 287 枉抛心力作诗人
——萧沉诗歌读后
- 297 朝向伟大的匿名性
——赵潭画作观感
- 304 在谛听静观中等候命运的赏赐
——为方勇、陈智安、徐纲三人画展而作
- 314 绘画作为一种自由元素
——2015·天津“诗象与图铭——当代诗人绘画艺术展”前言
- 318 保罗·乌切洛的钟
- 322 一个人去写诗
——首届“《诗建设》诗歌奖”获奖感言
- 325 感谢命运那无尽的赏赐……
——《星星》诗刊2012年度诗人奖获奖感言

辑三

一个姑娘在站台上哭泣

- 329 沉闷的空气中有惊雷的消息
334 母亲的手机
338 一个姑娘在站台上哭泣
341 痣迹人生
344 垃圾人生
347 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
350 告诉我你想怎么死，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354 爱和恨，全由你操纵
357 哭声与微笑
361 家门口儿
364 不觉闷
368 各色
372 骑驴
376 附：自我体制化，才是最可怕的

——朵渔访谈



辑一

黑暗时代的
精神遗嘱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纪念莱蒙托夫二百周年诞辰

如果莱蒙托夫尚在，就不需要我，也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了。

——列夫·托尔斯泰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那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我们刚跨出摇篮就足足地占有

祖先的过错和他们迟开的心窍，

人生令人厌烦，好像他人的喜筵，

如在一条平坦的茫茫旅途上奔跑。

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

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来，

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

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
恰似一只早熟又已干瘪的野果……
不能开胃养人，也不能悦目赏心，
在鲜花丛中像个举目无亲的异乡客，
群芳争艳的节令已是它萎落的时辰！
我们为无用的学问把心智耗尽，
却还嫉妒地瞒着自己的亲朋，
不肯倾吐出内心的美好希望
和那受怀疑嘲笑的高尚激情。
我们的嘴刚刚挨着享受之杯，
但我们未能珍惜青春的力量，
虽然怕厌腻，但从每次欢乐中，
我们总一劳永逸地吮吸琼浆。
诗歌的联翩浮想，艺术的件件珍品，
凭醉人的激情也敲不开我们心房；
我们拼命想保住心中仅剩的感情——
被吝啬之情掩埋了的无用的宝藏。
偶尔我们也爱，偶尔我们也恨，
但无论为爱为憎都不肯作出牺牲，
每当一团烈火在血管里熊熊燃烧，
总有一股莫名的寒气主宰着心灵。
我们已厌烦祖先那豪华的欢娱，

厌烦他们那诚挚而天真的放浪；
未尝幸福和荣誉就匆匆奔向坟墓，
我们还带着嘲笑的神情频频回望。
我们这群忧郁而将被遗忘的人哪，
就将销声匿迹地从人世间走过，
没有给后世留下一点有用的思想，
没有留下一部由天才撰写的著作。
我们的子孙将以法官和公民的铁面，
用鄙夷的诗篇凌辱我们的尸骨，
他们还要像一个受了骗的儿子，
对倾家荡产的父亲尖刻地挖苦。

([俄] 莱蒙托夫《沉思》，顾蕴璞译，1838年)

182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少年赫尔岑在父亲的书房门前听到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亚速海边的塔甘罗格去世了。“我从没想到他会死，”赫尔岑回忆道，“前不久我还在莫斯科见过他，他刚从霍登广场阅兵回来，安详地骑在马上，面色和蔼，线条柔和，显得疲惫而伤感。我朝他举起帽子，他含笑点头致意……”

那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冬天。由于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子嗣，按俄国皇位继承法，应由其弟康斯坦丁继位。正当彼得堡的店铺中竞相出售康斯坦丁皇帝的画像时，却传来了皇储放弃皇位的消息。原来，当年亚历山大一世上位时，曾参与过谋杀他们的父亲

保罗一世的阴谋，康斯坦丁不愿再登上那滴血的皇位。相互推辞了 16 天后，皇位继承权最终落入了老三尼古拉一世手中。紧接着又有消息传出：彼得堡发生叛乱了，加烈拉大街遭到了炮击。这次起义，由一些贵族军官率部发起，集合了约三千兵力，列阵在参政院广场。这些贵族军官曾参与过当年的俄法战争，亲历过欧洲的繁荣和俄国的落后，对沙皇专制政权早感不满，要求沙皇废除农奴制和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国家。然而起义仅仅持续了一天，就被尼古拉一世的近卫骑兵军镇压了。

随后便是全城大搜捕，乌云密布彼得堡。佩斯捷利上校、穆拉维约夫上校、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等起义领袖悉数被捕。大家都期待着被捕者能够减轻刑罚，因为宫中即将举行加冕典礼。善良的人们都认为，至少不会执行死刑，因为俄罗斯民族早已不习惯死刑了。事实上，自从著名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绞刑，一位发动政变的陆军少尉曾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判处死刑外，在俄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死刑是不存在的。保罗一世统治时期，顿河流域一些哥萨克叛乱，法庭判了两名军官死刑，但没人敢执行，最后奏请沙皇裁决。保罗一世说：“这些人统统是老娘们儿，他们想把死刑的责任推给我，这很好，谢谢他们。”然后他大笔一挥，把死刑改成了苦役。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虽然也曾因几首小诗流放过诗人普希金，但总体来说还算清明，至少还没有专设的独立宪兵机构，没有对十二月党人的早期活动进行严酷镇压。然而尼古拉一世登基伊始，便将死刑引进

了俄国宪法，并将五位十二月党人领袖处死。为此，克里姆林宫还举行了特别祈祷大典，以庆祝死刑的执行。皇亲国戚和大臣们都参加了祈祷仪式，广场上跪满了密密麻麻的近卫军，大炮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轰鸣。“绞刑架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么辉煌的胜利，尼古拉明白胜利的重要性！”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那时是十四岁的孩子，混在人群中，也参加了这场祈祷。就是在这里，在这被血腥的祈祷玷污的圣坛面前，我立誓要为死难者报仇，把自己的人生献给反对这帝制、这圣坛、这大炮的斗争。”

除五人被判处死刑外，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奥博连斯基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随着十二月党人被严酷镇压，整个社会舆论也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大家道路以目，不敢对党人们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唯有妇女没有参与这场背叛亲人的丑剧，”赫尔岑说，“她们屹立在十字架旁边，面对血腥的绞刑架而毫无惧色。”就如雅各宾党人卡米尔·德穆兰的妻子柳瑟尔，这位革命的奥菲利娅冒着死刑判决的风险，不肯离开丈夫半步，并最终被送上断头台；当行刺法王路易·菲利普的青年阿利波被押上断头台时，向他伸出同情之手的，是女作家乔治·桑。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也没有抛弃自己的丈夫，这些伟大的女性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财产和地位，怀着对受难者不灭的爱，与苦役犯们一起踏上了严酷的流放路，去分担苦役犯丈夫的厄运。她们在俄罗斯大地茫茫雪原上艰难前行的身影，像圣女一般刻印在俄罗斯人心灵的底片上，成为他们勇气、善良、尊严等精神信仰的

不竭源泉。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罗斯进入了最黑暗的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三十年代”。这位踏着反叛者的血迹走上皇位的专制统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五座绞刑架，还有数不清的流放、苦役和兵营，并建立了书报检查制度，以及独立的秘密警察组织“第三厅”，并任命卞肯多夫为厅长。

十二月党人起义那年，莱蒙托夫才刚刚十一岁，正跟着外祖母享受南高加索的自然风光。他的外祖母出身于名门望族斯托雷平家族，与十二月党人领袖们多有联系。因此，莱蒙托夫虽未参与当年的革命，却是革命的“精神孤儿”。莱蒙托夫与赫尔岑算是同龄人，赫尔岑稍长两岁，两人虽交集不多，但成长的社会背景却是相似的。赫尔岑说：“他完全属于我们这一代。我们都太年轻了，没有能参加十二月十四日的起义。我们虽然为这个伟大的日子所警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和流放。我们被迫沉默着，忍着眼泪学会了沉默不响，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来——那是什么样的心思啊！那不是使人开朗的自由主义、进步思想，那是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的思想。”“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这几个关键词不仅是那一代“革命孤儿”们的精神底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概括莱蒙托夫的诗学风格。

1828年，莱蒙托夫作为半寄宿生进入莫斯科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这也曾是茹科夫斯基、格里鲍耶陀夫、恰达耶夫等人的母校。在寄宿学校，他开始学习普希金和拜伦的诗歌，并写下

了人生中的第一批习作，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我年轻，但心中沸腾着好多声音，/我一心向往的是能够赶上拜伦；/我们有同样的苦难，同样的心灵，/啊，如果我们也有同样的命运。”这是他十六岁时写的诗，寻找着爱情，渴望着自由，梦想着不凡，同时又有一种对死亡的不祥预感。他曾屡次写到死亡：“我将怎样的结束这一生，我的心/将注定在何处漂泊，在什么地方/我将遇到可爱的事物、可爱的人？”（《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我哀求你！——用你仅有眼泪/来悼念那具冰凉的尸体。”（《这一天将会到来……》）“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还未可知还未可量的年轻诗人/同他一样，是人世放逐的流浪者，/但却深蕴着一颗俄罗斯的心。/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不是的，我不是拜伦》）“我早早地开始了，将早早地收场”，莱蒙托夫凭借着青春本能所写下的诗句，仿佛是为自己的命运下的谶语。契诃夫就曾感叹道：“我无法理解，他还是个孩子，怎么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唉，要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么死也瞑目了！”

1830年，莱蒙托夫考取了莫斯科大学思想政治系。莫斯科大学和皇村学校，在俄国教育史上和当时几代人的生活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彼得大帝曾取消了莫斯科作为沙皇首都的地位，然而1812年后，拿破仑皇帝的进犯却使莫斯科重新取得了如首都一般的地位。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远离沙皇，使莫斯科大学成为俄国教育的中心。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有着

很浓厚的哲学和政治氛围，学校成立了不少兴趣小组和学生社团，如斯坦科维奇、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校时都组建过社团，其中以尼古拉·斯坦科维奇的影响最大。这位贵族青年仪表出众，心智殊优，性情良善，在道德与知识造诣上都远胜侪辈。他传扬寂静主义，倡言黑格尔学说，像一位超拔的圣徒一般与诸友朋相游，可惜享寿甚短（二十七岁），身后仅留下数首优雅、褪色的小诗和数篇残篇断简。别林斯基 1829 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比莱蒙托夫早一年，1832 年便因组织进步小组“十一号文学社”和创作反农奴制戏剧《德米特利·卡里宁》被学校借故开除。他真正成为大学生们狂热的精神偶像，是从 1835 年开始的，自那时起直至他去世的十三年间，他为各家报刊写下了几百万言激情澎湃的评论文字。赫尔岑与别林斯基同一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在校期间，他是个活跃人物，曾和朋友奥加辽夫一起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和共和政体思想。然而，当时校园里的政治空气已相当紧张，沙皇布置在大学周围的特务网络开始收紧，不少学生遭到逮捕、流放甚至突然失踪。莫斯科大学学生波列扎耶夫，仅因写了几首小诗便被沙皇送入兵营；克里特斯基兄弟，因对着沙皇的肖像咒骂，并挖去肖像上的眼睛而被捕，一人死于狱中，一人在流放地被害。赫尔岑和他的几个同学也因“企图组织秘密团体，发表犯法的言论”遭到了逮捕，并以“对社会有极大危害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几个青年学生干得成什么？还不是白白葬送了自己！”这是遭到流放的

赫尔岑们最常听到的社会论调。世态炎凉，不由人不沮丧。事实上，自十二月党人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些政治小团体均未能成事，这一方面缘自尼古拉一世采取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团体力量的贫乏与目的之不明确。

事实上，恐怖主义吓不倒青年们，皮鞭、绞索和苦役只是给青年们上的一堂必修课，当他们从恐怖主义的学校里毕业，他们会给予恐怖主义最致命的一击。“玩弄自由主义词句是危险的，从事秘密活动更是不可想象。一滴不小心为波兰洒下的眼泪，一句大胆说出的话，可以换来几年的流放、特务的迫害，甚至单身牢房。但正因为如此，这些说出的话，这些流出的泪，才格外重要。有时青年会因此而丧生，但他们死了，为解开俄罗斯生活的斯芬克斯之谜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不仅不会终止，而且会证明它的憧憬是完全正当的。”（赫尔岑）真正毒害青年们心灵的，是权衡利弊平庸乏味的市侩习气，是老气横秋自甘沉沦的犬儒主义。为年轻的冲动付出代价，这没有什么，可悲的是一个民族的青年一代没有青春气息。法国那些被卢梭的阴森、自由的生命诗篇哺育起来的青年们——圣茹斯特、奥什、马尔索、德穆兰、丹东、罗伯斯庇尔们，才是真正的革命青年，他们甚至都没活过三十五岁。当王朝复辟后，法国也成了老年人的天下，平庸势利的市侩主义开始抬头。在“赫尔岑小组”事件之后，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这中间是平静得令人窒息的十五年，“正是这十五年使俄国几乎一蹶不振，”赫尔岑说，“也正是